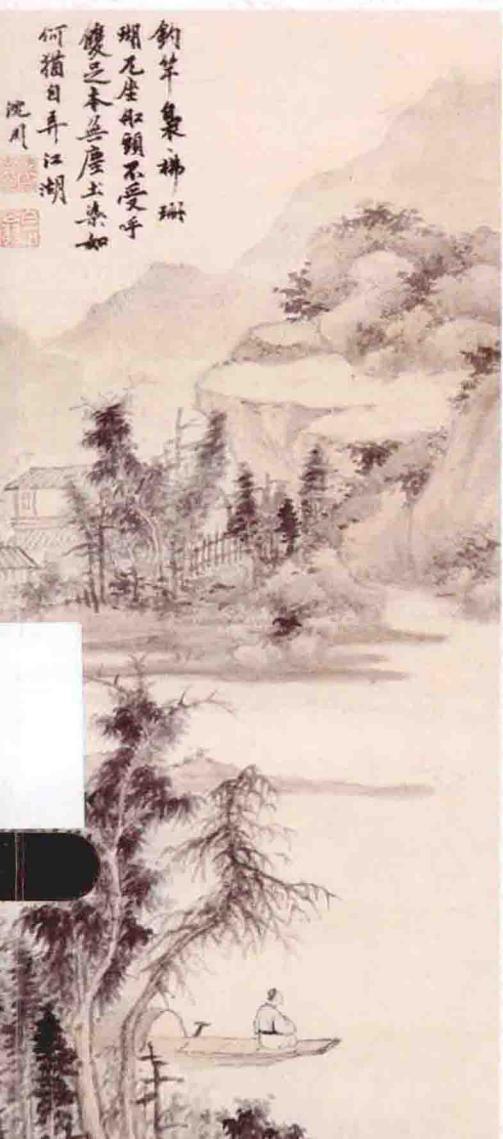


# 中国早期文学

## 社会边缘角色研究

郑瑞侠 著

江西人民出版社  
全国百佳出版社



# 中国早期文学

## 社会边缘角色研究

郑瑞侠 著

江西人民出版社  
全国百佳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早期文学社会边缘角色研究/郑瑞侠著.

—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13.10

ISBN 978 - 7 - 210 - 06153 - 3

①中… Ⅱ. ①郑… Ⅲ. ①中国文学－古典文学研究

Ⅳ. ①I206.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225948 号

### 中国早期文学社会边缘角色研究

作者:郑瑞侠

出版:江西人民出版社

发行:各地新华书店

地址:南昌市三经路 47 号附 1 号(邮编:330006)

发行部电话:0791 - 86898815

编辑部电话:0791 - 86899010

E-mail:taxue888@foxmail.com

2013 年 10 月第 1 版 2013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880 毫米×1230 毫米 1/32

印张:9

字数:300 千字

ISBN 978 - 7 - 210 - 06153 - 3

赣版权登字-01-2013-361

定价:30.00 元

承印:江西茂源艺术印刷有限公司

赣人版图书凡属印刷、装订错误,请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 目 录

<u>前 言</u>	1
<u>第一章 中国早期文学与社会边缘角色概述</u>	5
第一节 中国早期文学的分期与社会边缘角色的界定	6
第二节 中国早期文学社会边缘角色研究的理论基础 与方法	15
第三节 中国早期文学社会边缘角色的总体特征	22
<u>第二章 中国早期文学中的厨师形象</u>	27
第一节 厨师的社会地位与职责分工	28
第二节 古代厨师形象的代表伊尹和庖丁	33
第三节 中国早期文学中厨师形象的基本特征	44
<u>第三章 中国早期文学中的野老形象</u>	64
第一节 野老形象的身份与地位解读	64
第二节 野老形象刻画的特定环境显现	68
第三节 野老形象的性格特征和人格魅力	74

<b>第四章</b>	中国早期文学中的渔父形象	82
第一节	渔父形象的早期形态	82
第二节	渔父形象的发展变化	96
第三节	渔父形象的基本特征	100
<b>第五章</b>	中国早期文学中的医师形象	106
第一节	由巫而医的巫医群体形象	107
第二节	望之“断人生死”的神医形象	113
第三节	以医论国愿为帝王师的道医形象	124
<b>第六章</b>	中国早期文学中的剑客形象	130
第一节	诡异神奇的铸剑传说	130
第二节	剑意与道性相通的神秘剑术	139
第三节	早期剑客形象的原始形态及演化	143
<b>第七章</b>	中国早期文学中的工匠形象	164
第一节	神话中的能工巧匠形象	165
第二节	不同派别中的工匠形象	177
第三节	出入于崇道制器之间的角色特点	185
<b>第八章</b>	中国早期文学中的乐师形象	192
第一节	早期乐师的社会角色转换	193
第二节	早期乐师的社会职能转变	207
第三节	早期乐师的表演形式及特点	223

目 录

<b>第九章</b>	中国早期文学中的商人形象	<b>236</b>
第一节	影响早期文学商贾形象塑造的主要因素	237
第二节	早期商人形象的塑造及标准	248
第三节	早期商人形象的塑造特点	261
<b>结    语</b>		<b>272</b>
<b>参考书目</b>		<b>276</b>

# 前言

中国早期文学作品塑造了众多具有原型意义的社会边缘角色，后世文学在这些原型的基础上逐渐发展成为具有某种鲜明共性的类形象群。例如，历代文学作品中的渔父形象，普遍具有远离尘嚣、不关世事的澹泊心态，尤其是那位“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的老者，似乎早已成为中国文学史上渔父形象的一种定格性标志；而性格狷介，身怀绝技，行踪飘忽不定，望之便能断人生死，则是历代文学作品中经常出现的医师形象的共同特点。即使现代小说中的部分医师形象，无论是金庸《笑傲江湖》中救一人便要杀一人，性格极其怪异的“杀人神医”平一指，还是叶广芩《黄连厚朴》中似乎不食人间烟火，医道高深莫测的龚

老先生,仍难逃传统医师形象塑造的窠臼,依然具有神秘性。除此之外,“惯看人间世患,笑傲沧海桑田”的农夫野老、“寓大道于技艺”的庖丁工匠、“婉转新声,道剑合一”的乐师剑客等多种形象,都具有某种鲜明的共同特点。这些形象除了各自的独立特色之外,还具有非常明显的共同特征,即远离政治与权力中心,游弋于社会的边缘地带,统属“社会边缘角色”。

中国古代文学作品塑造了很多社会边缘角色,但是,以往的研究往往对他们有所忽略,未能引起足够的重视。如同属古代文学综合类专题研究范畴的主题学,近年来的研究十分发达,特别是上世纪末至本世纪初,“中国文学十大主题”研究,尤其是王力先生的“复仇主题”研究,均已达到相当水平;另外,意象学研究也受到许多学者的关注,傅道彬先生《晚唐的钟声》可以视作这类研究的代表作品。相对而言,学界对中国古代文学角色的专题性研究则涉及较少,虽然也有一些论文和专著发表,但这些研究成果更多关注的是帝王将相等重要历史人物,如张明非先生的“古代帝王与文学”研究;聂石樵《古代文学人物形象论稿》分为先唐、唐宋、元明清三编,充分论述了先唐文学中神仙形象的历史演变及其文化意蕴、唐宋文学中的人物形象及其演变、文人形象的历史演变、文学女性形象的演变,以及元明清戏曲小说的角色、雷同人物形象及女性形象,等等。至于社会边缘角色,却很少顾及。

中国古代社会的边缘角色,虽然人员众多,属社会基本成分,士农工商各阶层人员在早期社会各自都有集中的居住生活空间。但是,中国早期文学有关边缘角色的材料却极其零散,很难见到完整的篇章,像庖丁解牛、伊尹论味这类文献少之又少。因此,在中国早期文学边缘角色进行研究时没有完整的、系统的材料可以利用,而是要广泛浏览大量典籍,搜集和边缘角色相

关的材料。这是一个披沙拣金、集腋成裘的过程，需要作者付出艰苦的劳动。搜集工作完成之后，还要对大量材料进行系统梳理和深入研究，既要体现出历史和逻辑的统一，又要显示出文学研究的特点。对于中国古代文学的研究，人们往往习惯于对完整的作品、系统的材料进行解析，而对那些零散的文献或者是稍纵即逝的材料往往不够重视，经常失之交臂。材料来源的广泛性是本书的一大特点，举凡中国早期的诸子百家、正史野史、诗歌辞赋、神话传说等，只要是和边缘角色有关，都不肯轻易放过，在材料的搜集上，近乎搜罗殆尽。从这个意义上说，本书是中国古代文学和古典文献学相结合的产物。

对于学术论著而言，它的成功与否，一方面取决于材料的搜集是否完备，另一方面也取决于作者对于所掌握材料的提炼加工能力，后者实际上是对作者精神生产能力更加严格的检验。中国古代早期文学边缘角色的材料有相当一部分是先秦典籍，在文字解读上存在较大的难度，本书在对相关材料进行处理的过程中，比较注重文字的训诂和名物的考证，因此多有发现。例如，关于庖丁的“庖”字的解读，以及鸾刀和桑林舞曲关系的分析，使人们对早期文学作品中的厨师形象有了更深的理解。本书采用“循名责实”的研究方法，对于那些关键性的词语名称予以充分的关注，利用近百年来古文字研究已取得的成果，逐个进行破译，从许多司空见惯、熟视无睹的名词概念中，挖掘出它的历史、文化内涵。这种考证涉及人名、地名、称谓、神灵谱系、器物形制等，可以说是从微观入手并取得突破，以此为基础逐渐走向中观和宏观，最终形成比较严密的体系和完整的框架。就此而言，本书在中国古代文学和古汉语、古文字学的沟通方面，也有一定的意义。

本书和常见的古代文学研究论著有所不同，不但立足文学研

究,而且探索哲学。由于书中较多涉及古代的哲学理念,因此,使那些边缘角色的形象非常丰满,具有很深的文化底蕴,同时也使本书显得更为厚重,具有较强的理论色彩。例如,道器之变、德艺之分是中国古代哲学的基本问题。“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德成而上,艺成而下”是中国哲学的基本观点。按此,中国早期文学中的边缘角色,从事的是具体工作、实际操作,属于形而下的范畴。还有相当一部分靠技艺谋生的人,他们扮演的应该是社会低层次角色,属于“艺成而下”之流。可是,在早期的文学作品中,这些边缘角色,几乎毫无例外地实现了对自身的超越,他们的所做所言,远远高于他们所从事的工作,所处的社会地位。许多形象成为传道布教的使者,成为微妙之道的阐释者。他们虽然从事的是制造各种器具、表演不同技艺的工作,这些操作是具体的,甚至是艰苦的、琐碎的,但所阐释的道理却具有普遍性。例如,庖丁解牛之论、伊尹调羹之术、医和论天之六气与人之六情、师旷论乐等,都是通过自己的实际技艺阐释哲理和大道。这些边缘角色的高谈阔论,使我们对中国古代哲学,尤其是早期哲学的理解更加深刻,显示出与西方古典哲学的巨大差异,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这些边缘角色集中谈论的是道与器、德与艺以及道与技的关系,从中不难看出,中国古代早期哲学所关注的是本与末、现象与本质的关系,由此派生出一系列相关的哲学范畴,例如,形与神、虚与实、动与静等,而不同于古代西方哲学,关注更多的是主体与客体的关系。中国古代早期文学的边缘角色,他们从事的是具体操作,谈论的却是妙言大道,这一点具有共性。不仅如此,就是从事不同工作的边缘角色,他们的哲学观念往往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从他们的谈论中,可以体味到中国早期哲学的精髓。就此而言,本书在文学与哲学研究方面,也有一定的意义。正因为如此,本书将会为中国古代文学研究提供新的视角和方法,推动中国古代文学的研究向纵深发展。

# 第一章

## 中国早期文学与社会边缘角色概述

本书主要是从社会边缘角色入手,研究中国早期文学作品中人物形象塑造的原始生成、历史演变和总体特征。因此,关于中国古代早期文学分期的理由和社会边缘角色如何界定,是本书首先需要厘清的问题。

## 第一节 中国早期文学的分期与 社会边缘角色的界定

本书中的“中国早期文学”实指“中国古代早期文学”，这只是一个泛称，并非作为一个经过严密论证后的概念提出来，其主要作用是方便本书对研究资料选取的一个大概范围的限定。而“社会边缘角色”，则主要是从社会分工的角度加以确定的，即根据社会成员当时所充任的具体角色来确认他们是处于边缘还是中心。

### 一、中国早期文学的分期

中国学者对中国文学史的编写，始于 20 世纪初期，主要是受日本学者编写“中国文学史”的影响，以及高校教学之需。目前，被视为中国学者编写中国文学史的滥觞之作有“一南一北”两部。一部是北方林传甲，在京师大学堂师范馆执教时编写的讲义《中国文学史》；另一部是南方黄人，1900—1914 年在东吴大学执教期间编写的《中国文学史》。此后大量的中国文学史著作相继编写出版，据不完全统计，至上世纪末，在 200 部左右。

在这些数量众多的文学史著作中，尤其是 20 世纪以来的中国古代文学史编写者，大都习惯于采用朝代分期法，即按照历史朝代的更替划分文学发展的时期和阶段。例如，20 世纪初期的

代表作谢无量《中国大文学史》<sup>①</sup>,共五编六十三章,分上古、中古、近古、近世四个时期,远溯中国文学之起始,述其流变,叙其盛衰;胡适《白话文学史》<sup>②</sup>,虽为残篇,但也是按照朝代划分的,分为唐以前、唐朝、两宋等。

郑振铎《插图本中国文学史》<sup>③</sup>则是上世纪 30 年代的代表作,分为古代、中世、近代三卷,自古代文学鸟瞰至近代阮大铖与李玉,共六十四章,每一章分若干小节。所收材料有三分之一以上是同时期其他书所未论及的,如变文、戏文、诸宫调、散曲、民歌以及宝卷、弹词、鼓词等,并且首次附入插图,而且都很精美,不少还是珍品。此外,分别代表四五十年代,以及 60 年代的刘大杰《中国文学发展史》<sup>④</sup>、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中国文学史》<sup>⑤</sup>、游国恩等主编《中国文学史》<sup>⑥</sup>,等等,均采用的是历史朝代分期法。

20 世纪末到本世纪初期,随着古代文学研究的进一步深化,为了能够更全面、深刻地探求文学史自身的发展规律,许多文学史的编写者已经充分认识到“这种朝代分期法的确存在着一些致命的缺陷”。例如,北京师范大学教授郭英德认为:“在中国古代历史中,王朝的更替和政治的兴衰,不仅仅造成了社会的动荡,往往同时也促使意识形态发生不同程度的裂变。因此在对中国古代文学史进行历史分期时,我们不能不兼顾朝代兴

① 谢无量:《中国大文学史》,上海中华书局 1918 年版。

② 胡适:《白话文学史》,新月书店 1928 年版。

③ 郑振铎:《插图本中国文学史》,北京朴社 1932 年版。

④ 刘大杰:《中国文学发展史》,古典文学出版社 1957 年版。

⑤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中国文学史》,人民文学出版社 1962 年版。

⑥ 游国恩等主编:《中国文学史》,人民文学出版社 1963 年版。

替和政治变迁。但是这种朝代分期法的确存在着一些致命的缺陷。在历史上,文学的发展与政治的变迁并非总是同步的,更多的情况下二者具有历史发展的不平衡性,政治的盛世伴随着文学的萧条,而文学的繁荣却产生于政治的动荡,这种现象在中国古代历史上是习以为常的。因此,朝代分期法并不能切实地展现文学风貌的历史演进状况……既然文学史叙述必须以文学为本位,以文学作品为本位,那么我们所关注的焦点就不能以朝代兴衰为线索,而必须以文学自身审美风貌的转移作为历史分期的基本依据。”<sup>①</sup>所以,在郭英德和过常宝主编的《中国古代文学史》(21世纪中国语言文学系列教材)中打破了传统的历史朝代分期法,自觉地遵循一种新的文学史叙述原则,以现代人对古代文学的心灵感受和审美体验,重构了古代文学风云变幻的历史进程,尝试着将中国古代文学史划分为文学生成、文学自觉、文学多元和文学集成四个时期十三个阶段。

其实早在20世纪40年代,林庚已经认识到这个问题,并在其任教于厦门大学时编写的《中国文学史》中做了新的尝试。他将中国文学史划分为启蒙、黄金、白银、黑夜四个时代。1941年,前三编《启蒙时代》《黄金时代》和《白银时代》油印出版。1946年,第四编《黑夜时代》撰成,1947年5月全书出版,朱自清先生为之作序。也许因为林庚既是诗人,又是学者的特殊身份,所以他能以诗人的眼光来考察、研究中国文学史,以诗一般的语言进行写作,使这本文学史成为20世纪最有个性色彩的中国文学史著作之一。

但无论如何变化,只要是历史,遑论其他,都难逃时代的框

<sup>①</sup> 郭英德:《关于中国古代文学史写作的几点思考》,载《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5期。

架。所以,郭英德和过常宝虽以文学本身进展状态分期,也要标明历史时代加以区分,如第一卷是文学生成时期(上古至东汉中期,? ~ 146),其中包括三编:第一编为空谷足音(上古至西周末,? ~ 前 771);第二编为百家争鸣(春秋战国时期,前 770 ~ 前 222);第三编为雄风飞扬(秦统一至汉殇帝延平元年,前 221 ~ 106)。第二卷是文学自觉时期(东汉后期至盛唐,107 ~ 754),其中包括三编:第四编为风骨遒上(汉安帝永初元年至晋惠帝光熙元年,107 ~ 306);第五编为清玄雅韵(晋怀帝永嘉元年至梁敬帝太平元年,307 ~ 556);第六编为气象高亢(陈武帝永定元年至唐玄宗天宝十三载,558 ~ 754)。第三卷是文学多元时期(中唐至明中期,755 ~ 1521),其中包括四编:第七编为乱世情怀(唐玄宗天宝十四年至宋太祖开宝八年,755 ~ 975);第八编为光风霁月(宋太宗太平兴国元年至宋宁宗嘉定十七年,976 ~ 1224);第九编为分久必合(宋理宗宝庆元年至元顺帝至元十九年,1225 ~ 1359);第十编为死水微澜(元顺帝至元二十年至明世宗嘉靖九年,1360 ~ 1530)。第四卷是文学集成时期(明中期至清末,1522 ~ 1911),其中包括三编:第十一编为风云变幻(明世宗嘉靖十年至清康熙十七年,1531 ~ 1678);第十二编为回光返照(清康熙十八年至清道光二十九年,1679 ~ 1849);第十三编为衰极而变(清道光三十年至清宣统三年,1850 ~ 1911)。

再看,作为目前我国高校普遍使用的重点教材,由高等教育出版社组织出版、袁行霈主编的“面向 21 世纪课程教材”《中国文学史》四卷本,虽然提出了“河流”分期法,将中国古代文学史划分为“三古七段”,“河流有上游、中游、下游,中国文学史也可以分成上游、中游、下游,这就是上古期、中古期、近古期。三古之分,是中国文学史大的时代段限。在三古之内,又可以细分为

七段。”<sup>①</sup>如上古期是指先秦两汉文学(公元3世纪以前),其中包括两段:第一段,先秦;第二段,秦汉。中古期是指魏晋至明中叶文学(公元3世纪至16世纪),其中包括三段:第三段,魏晋至唐中叶(天宝末);第四段,唐中叶至南宋末;第五段,元初至明中叶(正德末)。近古期是指明中叶至“五四”运动时期的文学(公元16世纪至20世纪初),其中包括两段:第六段,明嘉靖初至鸦片战争(1840);第七段,鸦片战争至“五四”运动(1919)。由此可见,袁行霈“三古七段”的“河流”分期法,同样也是以朝代为标志体现文学的变化。

本书以中国文学作品中社会边缘人物形象塑造的原始生成、历史演变和总体特征为研究对象,重点部分是人物形象的原始生成和原型意义,而这部分主要存在于先秦两汉至魏晋时期的文学作品中。按照以往文学史的分期,应该属于传统分期法的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时期;或郭英德和过常宝所说的文学生成时期,以及文学自觉的前期;袁行霈所说的“河流”上游和中游的前端。有鉴于此,为了便于叙述,本书将这一时期统称为“早期文学”,即“中国古代早期文学”。

## 二、社会边缘角色的界定

如何界定中国早期社会边缘角色,是一个颇为棘手的问题,必须经过细致的梳理和分析才能给出一个较为明确的答案。不过,对中国古代早期文学作品中出现的社会边缘角色,本书则主要是从社会分工的角度加以确定的,即根据社会成员当时所充

<sup>①</sup> 袁行霈:《中国文学史》,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总绪论”第12页。

任的具体角色来确认他们是处于边缘还是中心。这里所谓的边缘和中心又是一对政治范畴,指的是权力中心和远离权力中心的社会空间。既然如此,就需要对中国早期社会的基本角色有一个清晰的划分,以确定哪些人物属于边缘角色,哪些人物属于权力中心的成员。

中国古代早期社会对于社会基本成员较为固定的划分,遵循的是“士农工商”四民分业法,这种“四分法”散见于《管子》的多篇论述中。例如,《管子·小匡》:“士农工商四民者,国之石民也。”这句话是说“四民”为国家之本,好像房屋的柱石,故曰“石民”。士农工商不是阶级,而是不同的职业群体,其分别仅在于所从事的职业不同。对此,《汉书·食货志》有着更为具体的解释:“士农工商,四民有业:学以居位曰士,辟土殖谷曰农,作巧成器曰工,通财鬻货曰商。”其实,本书所说的边缘角色指的就是“士农工商”四类人。在这四类人中,农,指的是农民、农夫;工,指的是百工,即各种制作工匠;商,指的是各种商人,包括坐贾行商。农工商都是自食其力的劳动者,在世卿世禄制占主导地位的先秦时期,他们没有入仕的机会。按照管仲的规划,要求“工之子恒为工”,“农之子恒为农”,“商之子恒为商”,试图把这种社会分工以及社会成员所担当的角色固定化、世袭化。在此基础上,管仲又进一步推行四民分居政策,“勿使杂处”,以保证各类社会角色的纯粹性。可见,农工商在这一时期属于社会边缘角色确定无疑,而且当时严格的社会等级制度也不允许他们进入政治中心,《国语·晋语八》所记载的晋国大夫叔向的一段话,可为一佐证:

夫绛之富商,韦藩木棟以过于朝,而能金玉其车,文错其服,能行诸侯之贿,而无寻尺之禄,无大绩于民故也。

绛地当时是晋国的国都。韦藩木棟,指的是以熟牛皮作为